



尹羲与欧阳予倩
夫妇在一起

迈进毋畏途路艰

欧阳予倩在广西从事抗战戏剧运动轶事一束

· 蔡定国

在抗战八年中，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戏曲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曾两次来到广西战时省会桂林，度过了七年之久。他在献身桂剧改革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戏剧运动，在桂林留下许多动人事迹。

幽默风趣的“杜门诗”

1941年底，端木蕻良从香港脱险，途经东江游击区辗转来到桂林，结识了正在桂林的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端木是小说家，但在欧阳先生的热情鼓励下，竟被拖“下海”，也搞起戏剧创作来了。

为了一鼓作气把《柳毅传书》这个剧本写完，端木蕻良在大门上贴上了“谢绝来访”的字条。不仅如此，他还将字条一张一张地从楼下一直贴到楼上。一天，欧阳先生去找他，到了门口，抬头一看，“谢绝来访”四个大字映入眼帘。“你谢绝人家可以，谢绝我不行”，欧阳先生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迈步进。他径直走到楼上，一看没有人，原来是个“空城计”。欧阳

先生这时诗兴突发，提笔写了一首“杜门诗”（被杜绝于门外之意）贴在门上：

女儿心上想情郎，
日写花笺十万行；
月上枝头方得息，
梦魂又欲到西厢。

时隔不久，欧阳先生又去找端木蕻良。因为上一次去扑了一个空，这次去能否见到也没有把握，于是在出门之前，先写好一首绝句带在身上，准备和端木开个玩笑，上款落的是“红娘小姐”，下款戏称自己为“小生”。这一次去可没有白跑，欧阳先生见端木蕻良正在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便悄悄把那首绝句从窗户外面塞了进去：

春宵何处觅情郎，
拥被挑灯春恨长；
吟到拟云疑雨候，
小生端合便敲窗。

端木看到末一句，向窗外望去，只见先生恭立窗外，赶紧起身相迎。

“花生伯伯”与马彦祥

欧阳予倩从“孤岛”上海来到桂林后，住在榕荫路13号，过着非常清贫俭朴的生活。他住房附近，有个卖烤红薯的小摊子，每天早上去排戏时，就去买两个烤红薯当早点吃。平时，辣椒和豆腐乳是他送饭的主菜，有时喝几杯烧酒，就用炒花生来送。久而久之，桂林文艺界同人送给他一个雅号——“花生伯伯”。

“花生伯伯”自己省吃俭用，但对革命的同志却非常慷慨大方，心里象揣着一盆火。当时，戏剧家马彦祥受到特务监视，不便在社会上公开活动，隐居在离榕荫路不远的马房背。“花生伯伯”对他关心备至。一次，他叫桂剧名旦尹羲去给马彦祥送饭。在路上，年轻的尹羲好奇地掀开盖在篮子上的毛巾一看，菜里面有鸡蛋，有猪肉，尽是好吃的，比欧阳老平时吃的菜好过几倍。马彦祥每次端起欧阳先生给他送来的热腾腾的好菜好饭，总是激动不已，对欧阳先生充满着无限的感激之情。

不惧风险“庇护”肖崎

1944年初，长驻桂林的新中国剧社，接到一份抗敌演剧队第五队从贵阳发来的“通告”，点名开除该队演员肖崎（现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原名杨斌颢，参加五队时易名杨绍乔），声明今后他的一切行动与五队无关。

肖崎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被开除？新中国剧社疑惑不解。

原来，肖崎曾任贵州安顺地区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因被敌特发现，逃到广西柳州，设法进了五队。湘桂大撤退时，五队从柳州出发前往云南，第一批由丁波同志带领先期到达贵阳后，突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敌特机关已侦察到肖崎的行动，准备在汽车过关例行检查时，将肖崎逮捕归案。丁波得到这一意外消息后，立即派许之乔将情况告诉队领导和肖崎。经队领导同意，肖崎立即离开五队返回柳州，在舒模和张客二人帮助下，到桂林参加新中国剧社。

五队的领导，为了不给整个队招来横祸，不得不制造一些假象，以发“通告”开除肖崎为名来迷惑敌人。但肖崎的真情未被新中国剧社所知，因此，当他们接到“通知”后，误认为肖崎是坏人，迫使他当天离开了新中国剧社。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肖崎在桂林文化界人士经常出入的“华英厅”偶遇欧阳予倩先生。欧阳老问肖崎为什么不随队去云南？肖崎不便将真情相告，只

是胡乱编了一些理由。欧阳老也不再追问他什么，高兴地跟他说：“那正好，帮我个忙吧，广西省立艺术馆明天就要上演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正缺一个合适的演员，你来怎么样？”肖崎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在第二天招待文艺界的首场演出便登上了舞台。一位在台下看戏的新中国剧社的领导人，发现肖崎这个被“通告”的“坏人”，竟在台上扮演剧中的周经理，散戏后找欧阳老，建议辞退肖崎。

欧阳老设法了解了肖崎的真实情况，他决意不顾风险，保护革命同志。他把肖崎请到自己家里，热情地告诉他：“你的情况我弄清楚了，我决定请你继续演下去。可是对外不能不讲点策略，就说我要考验你几个月，暂时不发工资，也不算艺术馆的正式成员。过了这一段，你将成为艺术馆的正式成员。你现在的工资我给你保留着。”欧阳老还考虑到肖崎生活有困难，亲自去通知会计借钱给他，后来，欧阳老还排除各方面的阻力和干扰，大胆启用肖崎，让他在参加西南剧展演出的多幕剧《旧家》中，担任主要角色。

需要什么就给什么

1940年，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交给抗敌演剧队七队长吴荻舟两个从延安转来的歌剧剧本，一个叫《军民进行曲》，另一个叫《农村曲》。这两个歌剧本都是歌颂八路军与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

七队接到剧本后感到，要上演这两部歌剧，困难不少，首先是队里的人力物力难以胜任，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戏在当时的桂林能不能上演？上演后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队的存在？吴队长带着这些问题，去找身为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的欧阳予倩商量。欧阳老坚定地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在桂林上演延安的新歌剧：“我支持你们，艺术馆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只要艺术馆有，你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

欧阳老说到做到，派出导演、舞台工作人员和乐队指挥陆华柏教授等人，协助七队成功地演出了延安的新歌剧。观众在国统区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八路军的高大形象，看到八路军和敌后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严斥李处长

1944年春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期间，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参加演出的四幕话剧《家》（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受到国民党在桂林设立的图书杂志（包括上演剧目）审查处的刁难。

这出戏的报审手续早已办了，审查处的老爷们也来看了彩排，演出广告已登出，戏票也发了，但一直等到上演的当天上午，审查处还未把准演证发下来。四队的演员们着急，西南剧展大会主任欧阳予倩更着急，他立即派大会秘书田念萱去找审查处。处长开始装糊涂，不作正面回答，田念萱问得急了，他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处里具体分管的人对这出戏有点意见？”

“什么意见？”

“他们说，戏的第二幕瑞珏枕头边摆着的那本《安徒生童话》不合适，应换一本书。”

“换一本什么书？”

“换一本《中国之命运》（这是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一本反动小册子）。”

田念萱听了那位处长的回答，真是哭笑不得。《家》剧反映的是1925年以前的事。《安徒生童话》这本书，正是瑞珏、觉新、觉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颇为流行的通俗读物，将它放在瑞珏的枕头边，自然是合适的。而《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3年方出版发行。生活在1925年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怎么能把一本1943年才出版的书放在枕头边，再说与人物身份、性格也“风马牛不相及”。田念萱回来将情况如实向欧阳老作了汇报。那位处长也是湖南人，是欧阳老的家乡，以往，他也不时来找欧阳老攀谈。欧阳老听田念萱这么一说，对这位老乡顿时火起，以为他此举纯属政治性刁难，于是，马上给他通电话，先毫不客气地指责了他一番，然后几句话就把处长唬住了：“西南剧展的会长是省主席黄旭初，要是为了一本书把事情弄僵，影响演出，这后果你能负得起吗？”欧阳老胜了，《家》剧于当晚如期演出，放在瑞珏的枕头边的，当然还是那本《安徒生童话》。

父女逃难到黄姚

黄姚镇是广西昭平县府所在地，抗日战争后期桂林沦陷，欧阳予倩举家逃难到此地，度过了艰难而难忘的岁月，直到抗战胜利，才又转回桂林。

在黄姚避难期间，欧阳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欧阳老是著名戏剧家，但穿著非常朴素，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初到黄姚镇时，很多人不认识他。有一天，他路过黄姚镇附近的西平村，见一位老先生正坐在家门口有板有眼的拉京胡，便迈步过去打招呼：“老先生，你的琴拉得很好，让我来试唱一板吧？”这位拉京胡的老者名叫王广有，听欧阳老这么一说，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心里想：“你这个疏散

来的难民，能唱什么？”心里虽然这样想，胡琴还是不快不慢地送出了桂剧《南路》的过门，欧阳老轻松地唱了起来，优美动听的声腔在山村的上空回响。在场的一位知情人告诉王广有：“这是广西省立艺术馆欧阳予倩馆长，大名鼎鼎的戏剧家！”王广有顿时肃然起敬，称赞不已。

1945年元旦那天晚上，欧阳老在黄姚古戏台举办盛大的联欢会，节目很多，都很精彩，尤其是欧阳老安排女儿欧阳敬如表演的独唱《芦沟桥问答》、《铁蹄下的歌女》、《日落西山》等革命抗日歌曲，唱得清脆明亮，真挚动人，台下响起一阵阵振耳欲聋的掌声，把整个文艺晚会推上了高潮。

可以禁演一字不改

欧阳予倩为南华戏院编导的桂剧《梁红玉》演出后，轰动桂林，盛况空前，连演二十八场，场场爆满，观众无不交口称赞。

《梁》剧是欧阳老在战火纷飞的“孤岛”上海写成的，“歌颂了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人物，暴露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罪恶，而且借剧中老百姓的口说出了显然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话”。比如剧中有这样的台词：“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要想高官做，多擦雪花膏。”这本是影射“美男子”——大汉奸汪精卫的，可是，一些达官显贵“对号入座”，以为揭了他们的“疮疤”，于是买通一些“观众”在剧场起哄捣乱，这还不够，后来竟从幕后跳到幕前，跟欧阳老来了一次“短兵相接”。一天晚上，当戏演到梁红玉与丈夫韩元帅为“兵源不济”而口舌交锋时，韩元帅责怪老百姓不踊跃应征从军，梁红玉理直气壮地答道：“只怪你们这班老爷们待百姓太好了”，“百姓们怕你们这班老爷们还来不及呢！……”梁红玉左一个“老爷们”，右一个“老爷们”，说得台上的韩元帅无话可答，而台下那些看戏的老爷们，听在耳里，刺在心里，如坐针毡。其中，尤以财神爷黄钟岳（当时任广西省财政厅厅长）更为突出，他不等戏演完，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后台，与欧阳老展开一场舌战。

“欧阳先生！中国的‘老爷’们也有蛮多的好‘老爷’的啊！”“是呀！所以好‘老爷’就用不着多心呀！”

“梁夫人的嘴也太辣火了一点，先生可否为她稍易其辞？”

“可以禁演，一字不改！”

在“老爷”们的淫威面前，欧阳老铁骨铮铮，一身正气。那位财神爷落得个狼狈不堪的下场，只好悻悻然离去。